



澳门丛书

SHEHUI JIAOWANG XINGWEI YU RENTONG
AOMEN SHEHUI JIEGOU TANXI

社会交往行为与认同 ——澳门社会结构探析

◎ 聂安祥 /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澳门丛书

SHEHUI JIAOWANG XINGWEI YU RENTONG
AOMEN SHEHUI JIEGOU TANXI

社会交往行为与认同 ——澳门社会结构探析

◎ 聂安祥 /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社会交往行为与认同：澳门社会结构探析/聂安祥著.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12
(澳门丛书)
ISBN 978—7—218—06495—6

I. 社… II. 聂… III. 社会结构—研究—澳门
IV. D676.5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1622 号

责任编辑	柏 峰 张贤明
封面设计	方楚涓
责任技编	周 杰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印 刷	广州伟龙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5.25
插 页	2
字 数	211 千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8—06495—6
定 价	35.00 元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出版社网址:<http://www.gdpph.com> 电子邮箱:sales@gdpph.com】

序 言

澳门作为南中国早期开埠的重要港口城市之一，经历了由葡萄牙人租借、据居和管理的过程，从明清政府管治、华洋共处分治到葡萄牙殖民统治，先后经过了数百年的历史。此一特殊政治、法律状况，在华人、葡人或富人、穷人心中都深深地打上了独特的烙印，也铸造了澳门社会独一无二的特性。在澳门居住多年、以《盛世危言》影响中国一代人的思想家郑观应的《澳门感事》，深刻而生动地描述了这个微型社会的特征，其中的一段这样写道：

华人神诞喜燃炮，
葡人礼拜例敲钟。
华葡杂处无贵贱，
有财无德亦敬恭。

1938年，英国诗人奥登（1907—1939）也写过一首题为《澳门》的十四行诗，从西方人的角度把澳门赌城的社会特质写得淋漓尽致：

澳门乃来自信奉天主的欧洲的一茎秀草
生根繁殖于黄山碧海之间
顽石里窝藏的是异域的果子
亦葡亦汉，稀奇古怪

救世主和门徒的洛可之图像





向呼五喝六的赌徒承诺身后的赌富
教堂与妓院比屋周旋，证实
信仰确能宽恕原欲

既获免罪，沉沦的小城何惧
凡尘种种罪孽——尽管强人因此
车裂于市，政府也因此解体于一旦？

宗教的时钟总会按时敲响，幼稚无知的劣行
总能反证犯者的良知未泯
澳门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总体上，澳门是一个以华人为主的社会，虽然深受西方的影响，但中华文化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澳门更是一个移民社会，居民从天南海北迁徙而来，乡音迥异，文化不同，风俗习惯差异很大，却能够相互包容，共生共存，在历史长河中屡渡难关，将澳门小城建设成为一个中西荟萃的现代化都市。在其中，政治治理沿用的是西方思维，法律规范应用的是大陆法系，社会组织是千姿万彩的社团，语言也五花八门。这样一个社会，到底该如何来把握住自我的心灵空间，如何始终坚持着对未来的向往，如何保证日常生活的稳定，诸如此类，都是澳门社会的现实问题，也是澳门研究中的重要内容。

近二十多年来，有关澳门研究的论述呈快速递增的趋势，各个学科和领域中都有着丰富的成果，尤其是在历史文化和现实政策等方面更有着独特的优势。历史学对资料的整理和挖掘既是历史学自我发展的良好契机，同时也为澳门其他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厚重的土壤。事实上，政治学研究也为这个过程中非常突出的研究主题，我们甚至可以说，多年来的历史研究主要围绕着政治主线展开。毫无疑问，几百年来澳门社会中各种政治力量的出现、发展和相互之间的制衡成为政治学最好的研究对象，何况这其中尚纠结着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融。此一独特的社会景观，更使澳门政治学研究形成自己与众不同的学科

特色。本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出现的。

本书同时选取了澳门社会中最宏观的政治结构以及澳门的政府状态、社团状态和微观的个体生存状态的相互动作为研究对象，其意义在于尽量把东西方文化的思想传统及其渊源所自的价值系统和生活方式结合起来，论述澳门人是如何在这样一个背景中来型塑自己的家园。有学者曾试图描绘澳门的这种混杂状态：“混在一起的时空与人在澳门产生出一种非欧洲非亚洲的与众不同的生活模式，存在着一种特有的不抵制接受其他民族风俗习惯的葡萄牙式的生存方式，一种共存的能力，一种力图入乡随俗而又不干涉他人的方式，和一种对世界各种生活方式中求和平的渴望。”^①而本书作者把这种状态进行了细化和解构，其中，华人的平衡、含蓄和忍让传统，在与西方法治思想的交融中，具有了更多的现代民主思维，而葡人也学会了东方的宗教信仰和各种文化习俗。文化的互动成为澳门社会场景中最为灿烂的一幕，产生了土生葡人这一独特族群，也给澳门社会提供了更多的发展可能性。

书中以交往行为内容为理论核心，围绕澳门政府、社团和个体三方的真实交往过程进行深入辨析，认为澳门政府在政治上通过几百年的主体变迁，葡方和中方都认识到澳门本土空间本体存在的重要性以及澳门社会治理和平的可贵。政府内部的葡人、华人和土生葡人在不断的交往中，在语言、生活方式、思维习惯方面不断接受彼此，并在实践中融合。同时，书中还着重分析了语言在澳门政府内部和外部交往中的重要性，粤语、普通话、葡语以及英语在澳门政府中交叉使用，但又各有优劣，在文本和个体的交流中解构并重组澳门整个的政府结构。

作者视澳门社团为澳门华人和葡人、土生葡人保持各自传统的阵地，但又在这个阵地中试探对方，接纳对方，最后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对方的一部分。正如书中所论，交往已经成为澳门社团主体之间自我的潜意识，他们不再很明确地有意识进入

^① 刘月莲、黄晓峰：《澳门：从历史失语症看跨世纪文化整合》，载吴志良主编：《东西文化交流》，澳门基金会1994年版，第589页。



到一种异质文化中，也不再感到本我在与他者交往中的差异，主体已经变成了行为者对他者同样的期待，甚至可以说，已经成为一种混合异质文化的新文化形式。正是这样一种状态，保证了澳门长久的和谐平稳，而书中的这个视角也为缓解当前全球化场景下日益激荡的族群交锋和冲突提供了新的路径。

书中分析了澳门华人个体的精神状态和政治状态，解释了他们在长期历史中作为无名氏的感觉和原因，并描述了他们重归社会的过程和意义。澳门社会中的华人个体长时间都处于被集体忽视的状况之中，他们无法获得合法的政府治理优势，也不能在行政上与近在咫尺的大陆相呼吸，他们只能在自我的精神世界中建造自己的家园。而这一点，正是他们的伟大之处。书中尤其强调了澳门个体在构造新澳门精神中所起到的作用，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默默无闻地为个体命运挣扎打拼，而这种不屈服于命运的境界，创造了他们在漫长的历史中能够保持自己精神的独立而不被奴化。因此，对于澳门社会中的个体而言，他们虽然可以在社会中得到主体的道德性，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得到有意义的解释，然而，他们的政治性和公共性始终有所缺失。最后，澳门个体公民通过积极参与澳门选举，回归政治社会，也建构着澳门政治社会。这个过程既是他们进入到政治体制的过程，也是他们自己成为政治公民的过程。特别行政区成立后，他们终于能够以其在漫长历史中积淀的民主意识和精神来主宰自己的生活和命运了，而回归的事实，也让他们产生了不孤单、被包容的感觉。这一视角的分析，深刻地描绘了澳门华人长期孤悬海外的真实境况，有助于认识我们民族本身在变化过程中对精神家园的呵护和文化传统的坚持，同时也证明了华人文化传统的巨大力量。

作者利用交往行为理论为分析基础，从语言本身出发，关注澳门社会主体与他者和周围世界的联系，正如哈贝马斯所说，“只有交往行为模式把语言看作是一种达成全面沟通的媒介。在沟通过程中，言语者和听众同时从他们的生活世界出发，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以及主观世界发生关联，以求进入一个共同



的语境”^①。澳门社会中的主体正是在这种如此关注沟通和交流重要性的情况下来达成行为的协调一致，追求各自目标的同时兼顾集体利益的，也正是因为在这种生活环境中建立起来的互动信任机制，澳门个体、社团和政府才能在进入政治社会场景后自然地走到一起。澳门社会正是依赖一直以来对语言的解释和尊重，在相互间的行为中形成了协调的条件和机制，“交往行为表现了一种互动，这种互动可以用言语行为来加以协调”^②。即便在社会冲突和危机的关键时刻，即便语言不通或产生误解、误读的情形下，日常生活中在互信基础上生成的协调机制依然可以发挥作用。

回归到当前的澳门状态中，我们既可以看到澳门公民基因中吸收的西方民主精神，也可以看到华人的儒家传统精神，而且充满生命力。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成立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的急速转型，民众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澳门民主社会的建设中。在日益复杂的政治社会形势下，我们更要清醒地认识到，特别行政区政治制度对原有澳葡政府的继承、改进和发展依然需要相当长的过程，与澳门民众的契合仍然需要极大的耐心与热情。回归前十年的反思和回归后十年的经验，为我们完善和建构一个适合新形势下澳门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可靠的基础。

主体的命运是哲学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当有的哲学家宣布主体正在消退时，澳门社会的主体正在努力建立与他者的关系——与政治的关系，与世界的关系，这种建构尽管并不一定也不可能在完全理性的轨道上，但毕竟这是澳门人自己的命运，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家园。

面对前路的不确定性，面对未来的挑战，我们当以平常心相看。澳门在历史上曾经历尽险阻，但均能安然度过。况且，

① [德] 尤尔根·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 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性》，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95 页。

② [德] 尤尔根·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 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性》，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01 页。



澳门如今的基础，比任何时代都要牢固。林语堂说得好：“他很少幻灭，因为他没有虚幻憧憬；很少失望，因为他从来没有怀着过度的希望。他的精神就是这样解放了的。”这句话，不也是澳门的真实写照吗？

多年前，中国人民大学张小劲教授关注、参与澳门学术发展的同时，鼓励门下研究生选题研究澳门问题。蒙小劲兄厚爱，受托与他一起指导学生论文，因而有机会跟安祥谈道论学，从中受益匪浅。安祥能够克服种种困难，完成论文并付诸出版，我自然感到欣喜。他嘱我写序，当义不容辞。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澳门社会本身是一块色彩斑斓的拼图，且其中边界模糊，别说一个远在北京的研究生，就是与澳门朝夕相处、在此地常年生活的我们，也对其如花如梦的历史和跳跃变幻的现实感到迷茫，没有清晰的思路和图景。安祥的论文，肯定有许多不足之处；其分析与见解也肯定有不少偏颇甚至错误的地方，希望读者多多包涵。

吴志良

2008年12月18日

目 录

序 言	(1)
导 言	(1)
一、选题动机与研究现状	(1)
二、运用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10)
第一章 澳门社会主体的主体性	(21)
一、澳门政治主体与语言交往	(22)
二、澳门政治主体：制度的嬗变与政治主体的出现	(31)
三、个体主体：回归政治与回归自我	(49)
四、社团主体：社会的裂缝和补合	(59)
第二章 个体与社团主体的交往	(68)
一、交往行为的结构	(68)
二、个体交往行为	(86)
三、社团交往行为	(99)
第三章 政治社团与政府主体的交往	(113)
一、澳葡政府主体的交往	(114)
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主体的交往	(127)
三、社团的非政党化	(134)



第四章 澳门政府语言交流	(152)
一、澳门的文本翻译与语言	(152)
二、澳门政府内部个体的文本与语言转换	(162)
三、澳门政府内部个体的语言交流	(172)
第五章 澳门主体交往的认同	(181)
一、澳门社会的政治认同	(183)
二、澳门的社会认同	(193)
三、澳门地方性知识的构建与认同	(200)
结 语	(218)
参考文献	(221)
后 记	(235)



本书以主体作为分析的逻辑起点，分别考察个体主体、社团主体以及政府主体的自我意识形成及其内部文化的变迁，以及这些变化对澳门社会内部结构的影响。通过对这三个层次的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动行为分析整个澳门的社会结构，并揭示这种行为交往是如何取得澳门空间的政治认同和社会认同的。

一、选题动机与研究现状

一个限定空间的理论研究的进路繁杂而多样，实证经验或是哲学阐述是政治学研究的习性选择，而每一条进路的选定都意味着对该区域性社会的某些领域或者主题的探讨和解构。研究方法和主题角度的多样性使得进入该区域的视域因研究者的需要而变得具体，具体到澳门场景，空间区域的狭小并未限定其内容的丰富和变化，历史和文化的丰富使得对它的研究状况气象万千。澳门在不同的时期呈现着不同的面貌，并始终在两个迥异的文化对话中担任文化交汇空间的角色。几个世纪以来，文化的碰撞、自我的探询、政治的变迁、命运的转折都衍生、整合着澳门社会结构和内部的认同。“混在一起的时空与人在澳门产生出一种非欧洲非亚洲的与众不同的生活模式，存在着一种特有的不抵制接受其他民族风俗习惯的葡萄牙式的生存方式，一种共存的能力，一种力图入乡随俗而又不干涉他人的方式，





和一种对世界各种生活方式中求和平的渴望”。^①

社会变迁的复杂性使得人们在澳门研究的政治和社会文化层面中需要更多地思考其独特性。

首先，澳门社会的独特性在于其独特的社会个体的构成。澳门社会中个体组成的来源是华人和葡人，以及在这二者基础上形成的具有更多历史和社会概念的土生葡人。一直以来，华人占澳门人口的90%以上，也是澳门社会文化形成的基础性力量。然而，由于澳门政治发展的独特性，华人既具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平衡、含蓄和忍让，同时，又不断受到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民主思潮的冲击。在与重视论证分析、个体思维以及民主法制思想的西方文化冲突交融中，澳门华人具有了更多的现代民主政治思维。华人的这种协调性文化使其能够在恪守中庸之道的文化平衡性的同时，保持自身在稳固基础上的潜意识文化的和谐变迁，从而维持了澳门政治社会发展的平稳和谐。葡萄牙人的特征正如潘日明神父所描述：“既积极又消极。先生活，后推理；先存在，后得知；先发言，后思维……‘我们的思维来自实践和具体。我们是直觉主义者；感觉到了才想到。’”^② 葡人寓居澳门，在从借居到租居、从租居到强居的过程中，不但给澳门社会带来了以天主教为核心的异质葡文化，而且逐渐进入澳门社会，与华人交往互动，相互贸易、杂处、通婚，构成澳门独特文化的历史动因。而且，在华人和葡人漫长的交往过程中，中西文化最突出的文化交融的产物——土生葡人形成了。土生葡人是澳门出生，具有葡国血统的葡籍居民，包括葡人与华人或其他种族的人结合而生的混血儿以及长期或数代在澳门生活的葡国人及其后代。其主要特点是：“1. 从人种学上看，土生葡人是欧亚混血儿。2. 从文化学上看，他们是东西方文化的产儿，具有两种文化背景，主要是葡国文化和中

^① 刘月莲、黄晓峰：《澳门：从历史失语症看跨世纪文化整合》，载吴志良主编：《东西文化交流》，澳门基金会1994年版，第589页。

^② [葡]潘日明著，苏勤译：《殊途同归——澳门的文化交融》，澳门文化司署1992年版，第68、69页。

国文化。3. 从语言学上看,他们是操双语者,既操葡语(‘父语’),又操粤语(‘母语’)。”^①这种先天的优势使得土生葡人在葡国对澳门的管治中,一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土生葡人是澳葡政府的主要人员构成,是政府赖以管治澳门的社会基础,也是沟通澳葡政府与华人社会的天然桥梁和中介者。而在社会中,土生葡人自组社团,参与澳门社会的日常交往,与华人社团形成良好的民间联系渠道。

其次,澳门社会的独特性在于澳门社会中独特的社团治理。在中国政治社会发展中,无论是从历时性还是共时性,或者是从地域的角度,都无法找到一个类似澳门的治理空间。社团作为社会治理的主体,并且在远离政府机制的情况下,对澳门结构的整合行之有效。较之香港情况,澳门以社会为治理主体的结构对于澳门政治社会的稳定发展有着学理和现实的意义。澳门社团从互助型封建团体,发展成为具有明显的现代民主特征的社团,构成了一个有别于中国其他地方的民间社会。这种社会结构的形成背景、运作机制、社会效用以及和政府的互动,都形成了对澳门社团的重要考察内容。尤其是原来脱离于政府管治机制之外的澳门社团,是如何进入政治体系,主动与政府沟通,并延续自己的社会治理结构,构成澳门社会的稳定的基石,这些都是澳门社团在特定时期提出的急需解答的问题。

再次,澳门社会的独特性在于澳门独特的政府—社会结构关系。澳葡政府^②由于其政府权威来源于远在万里之外的宗主

^① 盛炎:《澳门的跨文化交往——兼谈语言教学中的文化因素》,载吴志良主编:《东西文化交流》,澳门基金会1994年版,第601页。

^② 从严格法律意义上来说,澳门此前并不存在政府,《澳门组织章程》不但未规定政府的权限,连“政府”这个词也鲜有提及,其中管制机关可以译为政府机关,包括总督与立法会。但我们俗称的“政府”,仅指公共行政当局,即总督辖下的行政组织架构的总和。而所谓的政府成员,只包括总督和政务司。参阅黄汉强、吴志良主编:《澳门总览》,澳门基金会1996年版,第92页。而在本文中,基于澳门政治架构的特殊性,“政府”这个词包括了回归前澳门的总督和立法会以及公共行政当局,这三者特别是总督和立法会构成了澳门回归前政治的主要内容,而澳门的公共行政机构则作为一个主要对上级或者说对澳督负责的机构,它的存在建构了澳督管治的合法性,尽管这种合法性并未得到证明。





国，因而对澳门社会事务无法也无力做到有效管理，长期处于“无为而治”的状况，即所谓“小政府大社会”，这种状况给了澳门社团生存与拓展的空间。民间社团在填补政府社会教育、医疗和社会救济等方面的不足的同时，其内部结构和自主性不断得到发展，逐渐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结构——华人与葡人共处分治的双层二元复合社会结构。“双层”是指政府与民间两个层次，“二元”是指华人与葡人两个不同的社区单元。^① 在长期的社会管制演变中，逐渐形成了二元混合制的社会管理结构，即华洋共处分治。^② 澳葡时期的澳门华人社团虽然因为缺乏政治权力通道而无法成为政府体制的组成部分，但是并非完全不关心政策的制定，而是通过多种形式对政策形成和实施施加一定的影响。例如，各社团利用传媒，通过演讲、座谈、请愿、集会、游行、示威等方式，向澳葡当局表达意见、要求，对政府施加压力与影响，谋求对公共政策的倡议与监督。另外，澳门许多公共政策以及法律法规也吸纳渗入了各相关社团的意见与要求。回归后，二元体制依然存在，只是政府与社团之间不再是处于隔离状态的两个独立存在，相互之间建立起良性的沟通渠道。政府通过社团进行对社会的管理，社团协助政府实现对公共政策的执行。政府与社会相互交织，社会在政府之外，却并非压力集团，它们主动与政府沟通，也成了政府治理的一部分。

澳门社会的主体的多样性在日常和政治生活中导致交往行为的交叉和互动的多元，每一个主体都在其中努力展现自我的特性，却是以尊重和保持他者的本真为前提。同时，多元主体并非在单向度的意义上来表达自我尤其是在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他们都是在多元的维度上互动，共同来建构彼此对于对方的意义。

在图 0-1 中，作为社会原子化存在的个体形成了社会的基本构成要素，作为上一级交往主体公司或社团的基本分子，它

^① 姜胜华：《转型时期澳门社团研究——多元社会中法团主义体制解析》，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17 页。

^② 参阅吴志良《澳门政制》（澳门基金会 1995 年版）、《生存之道——论澳门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澳门成人教育学会 1998 年版）和《澳门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9 年版）中相关论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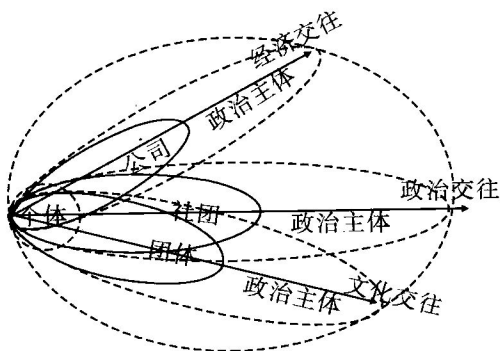


图 0-1 澳门社会交往的多主体与多维度

是整个社会和分析的起点。然而，个体的交往并非只是单向地指向政治或者是文化，人们日常从事的更多是经济交往，虽然并非每个个体都可以在经济体系内形成自我的有意识的交往关系，然而，他们通过进入公司或者是自组企业，进入到整个社会经济体系中。同样，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行为依然与政治主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互动，并依然遵守着政治主体治理的基本规则和要素。本书的分析角度更注重对政治和文化向度的分析，在这个层面上，个体作为有意义的文化和象征符号的载体，他们分享着社会存在的基本要义，在社会框架的每一层级和每一维度都维持本身的文化特征和政治性。个体始终处于有意或是无意识的行为交往过程中，即便是在其处于盲目的私人化的社会交往中，文化意义和符号始终区分和建构着他们自我和对于他者的意义，但这一切都只是个体的无组织的因而是无目的的交往状态，他们对于他者的认识只是一个存在物，无法系统获得认识他者的知识，更不用说解释他者和自身。只有在个体意识到自我对于他者和社会的意义，并有目的地组织起来，才算构成新的交往主体——社团，同时在保持自我的前提下，在新的层面进行社会交往。在社团层面上，新的交往结构和模式产生了，主体开始赋予社会存在新的结构和解释，主体获得结构性的建构力量，而不再只在个体的交往空间中建构传统的社会关系。社团在与政府的交往中获得合法的解释和来源，在和个体的交往中获得存在的意义。因而社团的角色不再只是





对于自我的责任，它需要承担起沟通个体和政府的双重交往空间的重任，并且需要始终在自我有意识的清醒状态下来保持对于政府和个体的阐释。政治交往并不只是在政治体系中的程序性表达，在澳门社会中，个体、社团和政府之间的交往行为交织在一起，文化交往和经济交往更多是在零散和日常的意义之上，获得对普通生活的解释。要架构整个澳门交往空间的主体交往模式，需要政府主体作为政治交往的主要向度。个体在与政府主体的交往中得到民主社会中的政治参与和政治认同的结构空间，而社团则是在制度规则中，不仅在交往中获得自我，同时获得对于个体和政府的主体性建构力量。

交往主体的多元和交往向度的多维，既是澳门社会空间独特性的标志，同时，这个多元空间也因这些独特性而获得更加复杂的解释。对于澳门政治社会的研究，首先要立足于澳门社会主体的互动性而建构，不能排除这三个主体的各自特性，以及更具解释力量的三者的互动结构和空间。然而，在澳门研究的成果中，长期以来只是历史的探询和寻微，甚少对澳门社会的整体分析和建构，更缺乏跨主题来交叉分析社会结构以及从政治学方面来讨论澳门变迁的动因。首先，在研究内容上：（1）个体主体研究，即研究构成澳门社会基本要素的个人，在对他们的个体特征融入其生存的空间和历史渊源的研究中，可以从微观和中观两个层次获得澳门个体的日常生活及其背后的深层文化背景方面的知识。此类著作主要体现在澳门社会历史资料中，包括对澳门华人、葡人和土生葡人的历史特征的概括，多数都是综述性的，论证澳门社会中个体的多元及其文化的繁杂。^① 同时还有澳门统计暨普查

^① 如郑天祥等的《澳门人口》（澳门基金会1994年版），郑天祥、黄就顺的《澳门人口的基本特征》（《南方人口》1987年第2期），张卓夫的《澳门人口的问题的症结与出路》（《濠镜》1987年），黄启臣的《四百年以来澳门人口的发展》（《南方人口》1987年第2期），郑天祥的《公元2000年的澳门人口规模预测》（《港澳经济》1986年第11期），郑天祥、粟明鲜的《四百年以来澳门人口的变迁》（《濠镜》1987年），钟逢干的《澳门人口研究杂议》（《南方人口》1987年第2期），陈栋康的《澳门的人口》（《港澳经济》1986年第4期）等论著中，都从澳门社会人口的客观状况及其与澳门社会综合状况的关系的角度阐述澳门个体的总体特征。